

论中国经济

50年

于光远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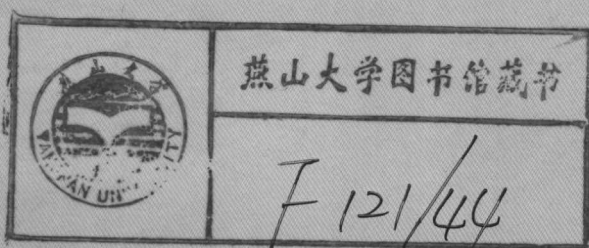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论中国经济

50年

于光远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0397109

05
10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经济五十年/于光远主编;何伟,晓亮,冒天
启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14-02523-X

I. 论… II. ①于…②何…③晓…④冒…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1949~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424 号

-
- | | |
|-------|--------------------------|
| 书 名 | 论中国经济五十年 |
| 主 编 | 于光远 |
| 责任编辑 | 吴 源 胡 凡 |
| 责任监制 | 王 旭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
| 邮政编码 | 210009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者 | 江苏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7.375 插页 5 |
| 印 数 | 1—6 000 册 |
| 字 数 | 388 千字 |
| 版 次 |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214-02523-X/F·585 |
| 定 价 | 26.00 元(精装) |
-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主编者言 于光远 1

- 一 “三个‘三十年’”和“五十年巨变” 1
- 二 全书的结构和作者们的分工 20
- 三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 23
- 四 关于所有制 34
- 五 关于分配 57

第一篇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冒天启 73

- 一 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得与失 75
- 二 二十年来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确立 112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72

第二篇 由单一的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

共同发展 晓 亮 217

- 一 建国五十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及教训 219

- 二 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33
- 三 所有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 250
- 四 国家所有制及其改革 287
- 五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 319
- 六 城镇集体经济改革 352
- 七 让股份合作制成为职工自主经济 375
- 八 非公有制是市场经济的生力军 398
- 九 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内涵 414

第三篇 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向多种分配形式

同时并存 何 伟 429

- 一 前三十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431
- 二 二十年来的改革在按劳分配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435
- 三 市场经济与按劳分配 477
- 四 按生产要素分配 507
- 五 建立市场经济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521

后记..... 于光远 549

主编者言

于光远

一 “三个‘三十年’”和“五十年巨变”

1. 书名是如何定下来的

这本书的编写是颇为特别的，需要向读者作一番交代，其中第一件事我想说一下这本书书名的由来。

事情得从 1994 年我发表《三个“三十年”》那篇短论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看了我那篇文章后向我约稿。他们希望我把这篇只有一千二三百字的短论扩充为一部著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但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写这部书，不想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于是我就同何伟商量，希望他并且通过他再找两位经济学家，由四个人合作完成这个任务。经过何教授的一番努力，征得晓亮、冒天启的同意，组成了这本书的作者队伍。

我想把《三个“三十年”》的全文引在这里，因为它是我们编这本书的源头，而且可以把它视作全文的一个提要，或者看作一个引言。

三个“三十年”

——是预想也是希望

最近我产生了一个三个“三十年”的想法。

事情也很凑巧——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起到一九四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恰巧经过整整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或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三十年，是第一个“三十年”。

接着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冬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恰巧经过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我国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曲折前进的三十年，是第二个“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这三十年结尾的时候，中国人民觉悟到必须进行一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场改革是继第一个“三十年”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第二个“三十年”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革命。

在前两个“三十年”之后，我想中国历史也许还

有第三个“三十年”。那就是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一九七九年 to 二〇〇八年。我认为有可能到二〇〇八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基本完成。所谓基本完成是指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体制，然后在稳定下来的这个新经济体制下，更有序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那个时候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也会有可喜的进展，并获得了继续进展的牢固基础。那时候我国也需要产生一部新宪法来巩固这三十年中取得的成果。

这是我的预想，也是我的希望

一九七九年我访问匈牙利时，看到这个只有一千零六十九万人口的小国，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正式宣布全国进行改革，到那时已有十一年了，但离改革的完成还很远。我就想到中国有十亿（当时的说法）人口，情况比匈牙利复杂得多，中国的改革在本世纪是不可能完成的。回国后我发表这个意见，有人劝我千万不要那么说，那会使人泄气。我说本世纪完不成并不意味着下世纪初也完不成，我还是很积极的。现在看来我这话说对了。现在我说二〇〇八年有可能基本完成这一场改革，是有一定根据的。我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大任务，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一是建立尽可能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一九九二年秋天离一九七九年才十三年多，党的十四大就通过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时间没有过半，从理论上、原则上取得共识，作出决定来看，任务完成过半。现在我们已开始了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我想到二〇〇八年我们还有十五年的时间可以用来使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同时现在开始花大气力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经过这十五年中的探索和争论，在二〇〇八年前是有希望解决问题的。未来的事说不准，更大程度上只是我的希望。如果说一九七九年我讲那样的话为的是劝人们不要把改革看得太简单，那么现在讲这样的话便是希望改革更激进些，不但要深化而且要加快。十五年的时间不算短，但是也会很快过去的。我希望大家都来做促进工作，同时愿未来十五年中我国的政治条件能够保证改革的胜利完成。

题目大，文章短，展开来的确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那篇文章虽然用了《三个“三十年”》的题目，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前两个“三十年”和第三个“三十年”作了回顾和展望，但我的着重点是第三个“三十年”中最后的也是未来的那十五年，所以我加了那个“是预想也是希望”的副标题。但我并不是去算命，而

是主张去做理论和指导思想的研究工作。因此当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胡凡同志再次来北京，同我和何伟同志商量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经过研究，决定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部分从略，全书的主要篇幅用来写今后十五年的预想和希望。我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十四大取得的成就是最了不起的。在这个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上，对在中国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么重大的事情取得了共识，作出了庄严的决定写进文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1992年秋天，我说的那个第三个“三十年”时间没有过半，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完成过半。但是我又估计到，事情的进展不仅要看已经作出了怎样的决定，还要看贯彻执行决定的实际行动。到我们动手写那篇文章时党的十四大已经开过了将近两年。那时我已发觉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都已经提出不少新问题。而在与贯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我又加上了一个社会产品（包括劳务）的分配，在这两大问题上，尚有属于基本理论性质的问题没有获得共识。而且不但在全党没有获得共识，就是在积极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中也存在着不同观点。我主张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和分配再认真地分别研究一番，写文章写书，以进一步加深对实

行市场经济的认识，在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上也能像党的十四大对市场经济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共识。我们身体力行也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们曾设想过我们的那本书的书名干脆叫做《第三个“三十年”》。但是考虑到我的那篇《三个“三十年”》虽然影响很大，很多学者注意到它，但是毕竟是个人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用《第三个“三十年”》这样的书名，很多人会看不懂。所以书的基本内容虽然定下来，书名却没有定，准备到快出书时再斟酌。

四个作者手边的工作不少，写书需要用的时间也就相当长。1997年召开了党的十五大。这个大会在关于所有制问题上有了可喜的进展，也可以说有所突破。但是也可以看出，道理仍然没有讲透彻。有些写到文件里的话，人们没有能很好的理解，更不要说展开和发挥了，有些不很准确的说法，仍在继续流行。分配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似乎只是重申以前的话，而且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提出不少问题。到现在，第三个“三十年”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再有十五年，而是不到十年了。我今天认为原先的设想可以不改变，原来要写的问题仍然要写，同时需要作新的思考。这就是“老话不能不说，新话也不能不说”。

在199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来京向我约稿时，还没有考虑这本书的编写同1999年纪念建国五十

周年结合起来的问题。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考虑到这本书最好同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结合起来，因此又来北京同我们商量：可否在原定的内容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书名定为《论中国经济五十年巨变》。我斟酌一番之后，认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是一件大事，江苏人民出版社为了这一纪念出版若干本著作，是一件应做的工作，而我们这本书论述的范围又恰巧符合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要求，于是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议，定下《论中国经济五十年巨变》* 这个书名。

2. 中国经济五十年发展的基本轮廓

书名定下来之后，原先写的内容就要作某些相应的调整，冒天启、晓亮、何伟三位同志在这个调整中花了不少时间。我现在也认为要用一点篇幅讲讲自己对“中国经济五十年巨变”的概念。

有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五十年巨变”这样一个提法很容易在人们中间产生一个误解，以为建国以来的五十年中我国的经济一直处在迅速进步之中，结果造成巨大的变化。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在《三个“三十年”》这篇文章中写道，从1949年开始的第二个三十年是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三十年。我的意思很明显，“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遭受了

* 此书最后定名为《论中国经济五十年》。

严重的挫折”，也就是说不能对这三十年结尾时 1978 年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作什么歌颂，不实地给予肯定的评价。否则怎么会在这三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觉悟到必须进行一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呢？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这三十年，中国历史分做三个时期。1949、1951、1952 年这三年历史上称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4、1955、1956、1957 年称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1957 年反右派斗争展开之后，到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加上在这之后的 1977 年和 1978 年的两年徘徊是第三个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接连十多年的残酷战争，中国经济更受到严重的破坏。抗日战争后的十多年中，中国农业减产了约百分之二十五，轻工业减产约百分之三十，重工业减产百分之七十，物价飞涨，上升了六百万倍。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农业超过抗战前的水平，工业除个别产品外也都超过解放前的水平，铁路运输方面不但修复和加强了旧线，还建成了成渝、天兰等新线。被破坏的国内贸易重新建立起来，国际贸易在禁运的限制下仍继续发展。在 1952 年秋就宣告了新中国三年的伟大胜利。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是以兴建、改建重大项目为特点的。其中苏联协助我国建设

的一五六項工程就是其中的骨干，建設的成就也主要在这个方面，經過這個時期的建設，以鞍鋼為中心的東北工業基地得到了加強。內蒙、西北、華北各地開始出現許多新的工業城市，五年內新建和恢復的鐵路達五千公里以上。工業生產方面除了鋼、電、煤、機床、棉紗、紙張等產量有顯著增長外，我們過去不能夠製造的某些發電設備、冶金設備、採礦設備、新型號的切削機床、大型鋼材、合金優質鋼能夠製造或者開始部分製造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為我國工業打基礎的時期。在文化建設方面，由於 1955 年底、1956 年初周恩來主持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會後制定了 1956 年到 1967 年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高潮，也為在這之後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局面。

在建國初期，從 1949 年到 1956 年這七年中，中國經濟的進步的確是偉大的。在這七年中，在社會生產關係方面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改造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並且對我國某些少數民族地區的原始公社性質的、奴隸占有制性質的、農奴制性質的生產關係進行了民主改革。這些的確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同時在生產力方面，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建設，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很顯著的。當然任何歷史時期都有這種和那種的問題，但並不影響我們作出“取得了偉大成

就”这样一个论断。

问题出在 1957 年反右派之后。1956 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我们能够贯彻八大精神，中国的经济就会有很大的发展，可是我们党没能很好地按照党章办事，没有再开党的代表大会，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精神抛弃了。而且在 1957 年反右派之后，开始了 1958 年的“大跃进”（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这时候倒是开过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 1958 年 1 月和 3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之后举行的。1956 年下半年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求压缩 1957 年的指标，防止已经出现的冒进倾向。毛泽东表示同意进行压缩，但在南宁会议上他指责这件事给群众泼了冷水，招致右派进攻。成都会议又作了进一步的批评，经过南宁、成都两次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经形成，1958 年 5 月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只是进一步造舆论，要求代表们接受既成事实。

我是党的八大代表，1956 年第一次会议和 1958 年的第二次会议都参加了。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报告和决议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我很赞成。但是我那时还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毛泽东的错误识别不出来。对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路线和八大

二次会议的错误路线都投了赞成票。在 1958 年的“大跃进”后，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会后掀起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再下去便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便是长达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二十年，总的说来，不能说发生了积极意义下的经济巨变。“巨变”也可以说是中性的名词，往坏的方向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可以叫巨变的，但是我们说的巨变只是积极意义上的，即巨大的进步。从这个观点来说，对中国经济五十年巨变这件事就要作具体分析。那就是对建国初期七年和 1978 年后的二十年能够这样说，而对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二十年就不能这样说。1977、1978 年比以前有进步，但也还带有徘徊性质，不能说巨变。说五十年巨变，只是从五十年的整体来说，并非指每个时期。恰恰相反，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二十年，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是处于停滞的情况之下。在这里我想不妨从《邓小平文选》中引出他的论断：

——“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

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①

——“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②

——“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228页。